在政协的日子里

◆ 烁 渊

1月26日,政协上海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幕。看到这个消息,我记忆的闸门又一次打开……

曾经也是这样的隆冬时节,也是这样的新年前后,我走进了第五届上海市政协会议的会场。

■傅全香(左)与范瑞娟为码头工人演唱

{1}我是公社小社员

1977年12月一天晚上,妻子中班下班疑惑地问我:“你什么时候变成统战对象了?”“什么统战对象?”我一头雾水。

1969年,高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上海港第七装卸区当装卸工。父亲是粮店职工,母亲是袜厂工人。装卸工算什么统战对象,父母双亲当然也不是。

妻子是我同校同届同学,毕业后在港区总机当接线员。这天,她接到一个自称是市委统战部的电话,点名有急事要找我。那时没有手机,家里也无私人电话。当来电者知道接线员就是我妻子,就要她转告我明天上午9点钟到上海展览中心参加一个会议。

次日,我参加了这个会议。原来这是市委召开的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的党员预备会议。

12月22日上午,作为新当选的上海市政协委员,我来到北京西路840号上海市政协办公大楼报到。

走进上海市政协2号楼三楼的“文艺组”会议室,只见满屋全是高龄长辈,我只认得其中一位王云阶先生,他是上海电影制片厂作曲家,到过我家约我与他合作电影插曲。

这个小组成员的大名个个如雷贯耳:巴金、孔罗荪、王西彦、王辛笛、师陀、吴强;金焰、王丹凤、黄宗英、韩非、舒适、曹韧、于伶、陈鲤庭、祝希娟、万籁鸣、黄绍芬;贺绿汀、桑桐、何占豪等。其中,巴金、王丹凤、祝希娟、黄宗英、贺绿汀等早在银幕或图片上见过,其他大家过去只闻其大名,个个都是德高望重、早在学生时代就仰慕的名家。

那时,政协文艺界有两个小组,我所在的组由文学、电影、音乐三个系统的成员组成。另一个组则由戏剧、美术、摄影、博物馆等系统的成员组成。这两个小组组成政协一个文艺界大组。因为写过一点诗歌、散文与文艺评论,我作为工人业余作者被编入文艺界的电影文学音乐组。在整个文艺界大组里,我与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的“喜儿”周慧芬、茅惠芳,还有一位金山农民画画家曹秀文算是“小字辈”(是年我29岁),被新闻媒体称为“最年轻的政协委员”。因为我写过一首歌词《我是公社小社员》,所以有些长辈就干脆叫我“小社员”了。确实,在这个文学艺术的“公社”里,我只是一株幼苗。

上海市五届一次政协大会,是在“文革”结束后不久、政协恢复之后的首次盛会,文艺界组的长辈无不都是劫后余生。永远难忘会议第一天的情景:只见他们久别重逢,一见面就紧紧拥抱,长时间的拥抱,互相为大难不死、重获新生而庆贺。

曾以为,在文艺界组这样一个集体里,一定可以学到很多文学艺术的创作经验。其实,在整个会议期间,文艺家们几乎不谈文艺创作,全是事关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政治议论。至此,我才理解“政协”真正的使命。在风雨过后的第五届市政协会议、活动期间,我感受到了文艺家对极左思想路线的切肤之痛,对祖国政治民主建设的呐喊;他们含着眼泪庆幸国家“凤凰涅槃”获得新生,他们带着历史的创伤憧憬祖国美好未来。宠辱不惊之淡定,境界胸怀至博大,令人肃然起敬。我在这里接受了政治的真正启蒙与思想文化的洗礼。

{2}傅全香一口答应

那天中午,在午餐桌上,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坐在我旁边,与我边吃边聊。她问我:“你们港口是不是苏北籍工人比较多,工人师傅都喜欢看淮剧?”长期以来,外界一直以为码头工人以苏北籍的居多,其实这是一种“误解”。即使五六十年代的上海港,“老码头”的主体也不全是苏北人,还有不少湖北人。而上个世纪70年代初,一大批“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”的上海青年学生进入海港,码头工人群体的构成发生很大变化,不仅提升了文化层次,原来的苏北籍的老职工还一下子变成了“小众”。

我把职工队伍变化情况告诉傅全香。随即,不失时机地问道:“傅大姐,你们越剧院好像还没来过上海港?”

“是的,从来没有去过。”傅全香回答。

“那,你看能不能请上海越剧院到我们上海港来作客呢?”

“好的,好的,我去跟老袁说一下。”傅大姐立即热情回应。她说的“老袁”,就是上海越剧院院长袁雪芬。

两天后,傅全香就告诉我,袁院长非常愿意带全体艺术家来上海港慰问演出。

我立即将喜讯报告给局里。港务局领导喜出望外,慎重研究后,指定由上海港第六装卸区接待。之所以没安排去我的“娘家”上港七区,完全是出于对艺术家们的关爱。

那时,车辆过江很不方便,上港七区又是煤炭装卸作业区,码头上到处煤山煤海,风一吹,煤灰满天飞,眼睛也睁不开,更不要说开口说话、唱戏了。而上港六区地处中山南二路日晖港附近,交通便利,码头上虽然也有煤炭装卸,但仅是局部区域,大部分是木材、化肥、粮食等堆装,相对干净些。

1978年盛夏的一天,我作为陪同与接待,早早就在码头迎候。上午十点半左右,一辆大巴缓缓驶进开平路上港六区的大门。满满一车的人,上海越剧院的表演艺术家“倾巢出动”了!除了袁雪芬院长亲自挂帅,傅全秀、范瑞娟作为委员朋友热情相助,还有徐玉兰、王文娟、金采风、张桂凤、吕瑞英、史济华、丫头王“孟丽英”等著名演员。如此强大的阵容到企业慰问演出,恐怕是空前绝后的!

码头上没有像样的化妆场所,就在食堂拦出一角做临时化妆区,但因陋就简丝毫没有影响艺术家们的热情。袁院长还提出,既要在礼堂里演出,也要到码头上去为正在装卸作业的工人们演唱。

这天的气温达到36摄氏度以上,身着短袖衬衫的艺术家们按码头有关规定全部头戴安全帽,在烈日下演唱。

袁院长首先致辞,她满腔热情的开场白让工友们兴奋不已:“码头上的工友们,你们辛苦了。这么热的天,你们没有在室内休息,还在户外太阳下工作。我们少不了你们啊!我们吃的大米、烧的煤都是经过你们的手接过来送过去,送到我们千家万户,我们要感谢你们!”话音未落,热烈掌声已经响起。

袁院长讲话后第一个上场,为工友们清唱一段。一曲唱毕,掌声如雷。然后,袁院长“钦点”中年男演员徐善发在码头上清唱《海港工人豪情壮》。这段唱腔是我写的唱词,越剧院作曲家编的曲,这是袁院长事先亲自设计的“应时段子”。

当徐善发唱到“满江春潮浪追浪,万船竞发豪情壮,千吨万担我托举,胜过托塔李天王”时,围观的工友们一起大声喝起彩来,“好!”“好!”江边来不及下梯的吊车司机坐在驾驶室“高位包厢”里观赏,这时也激动地长时间鸣笛向艺术家致敬。

接着,徐玉兰、王文娟、金采风等流派创始人个个献艺开唱。热辣辣的太阳烤得她们脸颊汗水直流,但艺术家们的金嗓子仍发挥得分外出色。那天,不巧的是傅全香大姐身体忽然不适,港务局领导劝她不要跟到码头上去了。可她吃了几粒白酒浸泡的杨梅,就直奔码头热情演唱,实在令人感动。

工友们看到这么多越剧名家倾情演出,激动、欢欣就像烧开的黄浦江水,情绪达到沸点。

{3}丹凤请我到她家

从小看过王丹凤主演的《家》《万紫千红总是春》《桃花扇》《女理发师》《护士日记》等电影,她有“绝代美人影星”之称,几十年倾倒无数观众。这次在政协与她同组交流,没想到还有机会去她家做客。

1978年秋的一天,王丹凤的丈夫柳和清先生约请我走进了陕南村他们宁静的家。

尽管王丹凤比我年长不少,见面时我没称她“王大姐”,却称呼她为“丹凤”——我这么称呼不是对她不敬。王丹凤原名王玉凤,青年时代投身电影艺术之后改名“王丹凤”,希望像丹凤朝阳一样永远为观众奉献艺术。丹凤与周璇同代,早在上世纪40年代已在上海滩声誉鹊起。现在,文艺界组的委员都叫她“丹凤”,昵称中充溢着一种亲情,更是对她艺术理想的高度尊重。所以,我这个“小社员”当然也就“随大流”了。

银幕下的丹凤朴素、平易,毫无大明星的架子。我一落座,她就关切地询问码头装卸作业的情况,问我露天工作是不是很辛苦,冬天上夜班是不是很冷,像慈母一样叮嘱我一定要多穿点注意保暖。

聊了一会儿,丹凤切入正题,说今天请我来是因为最近要参加一个中秋晚会,需要准备一个节目。过去,她在各种场合经常演唱的保留节目,是《护士日记》的插曲、脍炙人口的《小燕子》,这次她想要朗诵一首诗,于是想请我为她创作一首。

“勿好意思,叫侬帮忙,要辛苦侬了!”丹凤偶尔用酥软的沪语道白显得格外亲切。

我当即与丹凤、柳先生一起议论创作题材。柳先生是著名摄影家,丹凤许多流传于世的玉照都出自他手。

我提议就以小燕子为题材写首抒情诗,并阐述了创作的立意与构思。

王丹凤1948年离开上海,在香港拍摄了《锦绣天堂》《海外寻夫》《无语问苍天》《琼楼恨》等十几部电影,社会美誉度很高。1949年新中国诞生,她毫不犹豫回到上海,恋眷故土,绝不“见异思迁”。回国以后,她孜孜不倦为塑造一个个崭新的银幕形象勤奋工作,为后人留下许多宝贵的艺术财富。托燕言志,借燕抒情,由“小燕子”丹凤来完成这个表达,应该是很适合、很独特的。

一星期之后,我把拙作送到陕南村。诗歌标题为《啊!小燕子》,比电影插曲《小燕子》只多一个字、一个感叹号,不尽的意味就在这一字的感叹之中。

诗作结尾这样写道:

“啊!凌空展翅,播撒情思
那天空中的彩虹
是歌唱你的彩色线谱
更是你留给人间的绚丽生命交响史诗
昨天夜里,我做梦了
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小燕子……”

我忘情地读完拙作,丹凤与柳先生异口同声说“蛮好格”、“蛮好格”,就这样一稿通过。

就是这次机会,我还意外收获了一个“副产品”。丹凤接过我的诗作后,神秘地告诉我,她与30年前的自己“团圆了”。说着,她拿出一叠照片给我看。

照片上的丹凤婀娜多姿,青春飞扬。这叠照片一共9张,原来珍藏在台北的一幢别墅之中,收藏者是杜月笙之妻姚玉兰(即姚谷香)。1977年底,姚玉兰逝世。友人在整理她遗物的时候,发现她心爱的影集里夹着9张丹凤在香港的生活照片。之后,姚玉兰的亲友把这些照片辗转送到了丹凤的手上。

当时,海峡两岸尚处于“不相往来”的状态,而与丹凤年轻时一起从影的好姐妹卢碧云、周蔓华、欧阳莎菲当时都在台湾地区生活。这叠来自台湾的照片,引起丹凤对银幕姐妹的无限思念与期盼两岸统一的渴望。

回到家里,夜不能寐,连夜写下《一叠来自台湾的照片》。一星期后,发表在《文汇报》上。

{4}何占豪“故事连播”

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,以其鲜明的民族风格,赢得中国平民百姓的赞誉。以前听说此曲出自当年两位大学生之手,惊奇之余一直心存疑惑,大学生又不是专业作曲家,怎么会写出如此传世之作?因此,借着与何占豪在政协同组同桌之机,我很想揭开这个谜底。

何占豪比我年长十多岁,在开小组会时我们总是靠近落座。会议期间,他天天穿一件呢制中山装,风纪扣紧扣,一幅样子很严肃,但他其实很幽默,一口杭州官腔,听起来有点像越剧的唸白,蛮好听的。

五届一次会议从22日开始,31日结束。每天上午11点半休会,下午2点继续会议。午休时分,我与何占豪便在会议室闲聊。阳光透过花格玻璃洒进室内,暖意盎然。在这里,何占豪慢慢向我讲述了《梁祝》协奏曲诞生的全过程。每天中午讲一段,像是电台的“小说连播”。而他的“人生故事连播”也是那样引人入胜。

后来,每年一次的政协大会,我都是他的“故事连播”的忠实听众。以至于在以后的几十年里,他有什么事也会打电话召我到他家,听他继续“连播”,我们之间情同兄弟。

就因这“近水楼台”之利,后来我写下《春风拂面彩蝶飞》《化蝶》等长篇文章,向世人介绍了“梁祝的故事”。

我与何占豪也经常探讨一些社会的艺术倾向,有时也会有不同意见,但他从不介意。这几年,我时常请他参加我策划的一些活动,请他向更多的人传播炽热的爱国情怀与创新精神。每到一处,他的演讲总是那样激动人心。

去年10月的一天晚上,我按他的电话约请,到衡山路上“10号名邸”参加他的家宴。走进大厅,有点吃惊,七八桌团团围绕,不少名家在座。家宴为何排场这样大?他通知我的时候,只说是“儿子从美国回来聚一聚”的呀。

晚宴很热闹。他儿子向来宾表演了小提琴独奏,黄头发、蓝眼睛的小孙女跳起了芭蕾。何占豪的妻子小张是晚宴的主持人,她宣布了开奖规则,几乎全场近百号人个个有奖,皆大欢喜。

最后轮到何占豪发言的时候才“真相大白”。原来家宴是他八十大寿庆生。他要借这个机会向所有帮助过他的导师、朋友深深致谢。他说:“我何占豪有今天,都是各位师长、亲朋好友相助,没有大家,就不会有我今天。我谢谢大家,祝大家健康长寿!”

寿星向来宾送礼、致谢、祝福,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寿宴,这是他人生的又一“杰作”。因他们夫妻俩事前对所有来宾保密,所以现场不见鲜花、花篮与客人的馈赠。

我深切感谢政协赐予我一个码头工人一片新的天地。在那里,我结识了一大批文化界的大家,他们成为我的良师益友,给予我的教诲让我终生受益。

政协的委员朋友们肝胆相照,在政协的日子里,我的心一直像天空般晴朗。如今,他们中的大部分已先后离世,唯有我家珍藏的近十本访问记录,还能“听”到他们的振聋发聩的议论风生。我将永远怀念他们,怀念我在政协的那些日子……